

陈正府, 刘美新, 蔡晓梅. 关系地理学的知识谱系、研究范式与启示 [J]. 地理科学, 2023, 43(6): 972-980. [Chen Zhengfu, Liu Meixin, Cai Xiaomei. Theoretical geography, research paradigm and implication of Relational Geograph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43(6): 972-980.] doi: 10.13249/j.cnki.sgs.2023.06.004

关系地理学的知识谱系、研究范式与启示

陈正府¹, 刘美新², 蔡晓梅^{3,4}

(1. 贵州财经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贵州绿色发展战略高端智库/贵州财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 贵州 贵阳 550025;
2.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65; 3.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4. 华南师范大学文化空间与社会行为广东省重点实验室,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 梳理关系地理学的学术内涵、理论主张、研究范式以及热点议题, 指出关系地理学研究体现以行动主体为中心, 既注重国际流动、连通性、社会关系的分析, 也注重个体经验、认知与能动性方面的发掘; 既关注全球化对地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广泛影响, 又考察发生的在地化、文化再造、差异生产等现象, 有明显的去地域和去尺度化的趋势; 对区域政策或社会事件的解读, 多基于行动者网络和去人类中心主义视角, 注重情景、互动、阐释与偶然性的分析, 而不仅仅是总结模式或规律。关系地理学显示, 当下已不是某一单一理论或主要思想所能解释的时代, 它以一种去中心、异质化、动态化、多维度的特征体现了地理学思想的多元、包容与深刻。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潮与范式, 关系地理学在解释中国经验时需要有效地落地和对接, 而中国的传统“关系”概念、“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其可落地的最佳案例。

关键词: 关系地理学; 关系转向; 流动; 纠缠; 中国经验

中图分类号: K9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23)06-0972-09

随着全球化、网络化和元宇宙的出现, 流动、网络、互动、交流、多元、混杂成为当下人们日常生活的常态。空间不再被固定的地方与物理条件所限定, 而是充满着流动、混杂与关系; 距离的远近不再取决于地理尺度, 更多由注意力与关注度所支配; 边界已呈现出去地域、过程化和离散性的特征; 社区不只是一个空间定义的位置, 而是根据身份认同、集体归属和家园依恋来维系的社会网络; 地方所展现的互动与联结方式更具有一种去域性与跨时空性; 整体的、单一的全球地理空间既被人类想象所建构, 也成为了时空压缩的产物。关联性已成人类生活的显著特征, 比如地理学家 Massey 指出, “不同的社会群体与个人, 以不一样的方式被摆放在与这些流

动相互联结的关系里”“空间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关联性”^[1]。

这些社会现象与人文景观, 有着深刻的认识论基础。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期, 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兴起, 地理学出现了重新理解空间的思维范式, 这种思维范式与当下的社会转型和政治过程密切相关。由此, 人文地理学的认识论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即人们眼中的地理景观不再是地方、地点、区域、物质和生命的划分, 而是一切事物和现象的相互建构与关联。人文地理学认识论的转向, 使得关系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成为可能。关系地理学将地方、空间和尺度分析与多重身份、社会背景、权力关系、性别、认同、复杂性、社会正义以及不平等紧紧

收稿日期: 2022-08-25; **修订日期:** 2022-11-0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61029, 42071191, 42101232)、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2A1515010740)、广东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2022WSYS004)、贵州财经大学校级科研基金项目(2021KYZD10)资助。[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861029, 42071191, 42101232), Guangdong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2022A1515010740),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2022WSYS004), the Research Foundation of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1KYZD10).]

作者简介: 陈正府(1981—), 男, 土家族, 贵州印江人, 博士, 副教授, 硕导, 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学、文化产业和国际发展。E-mail: czf-sharp1981@163.com

通信作者: 刘美新。E-mail: 814086037@qq.com

密联系起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空间性,以及想象地理、赛博空间、时空压缩等议题的出现,关系地理学的学者试图在社会科学领域对传统的地理学进行拓展性理解,否认绝对空间的存在,反对本质主义和静态的结构分析,把空间视为不断制造和再制造的关系。如 Massey 提出“空间就是关系的生产”“空间是关系的产物”等观点^[2]。与此同时,伴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森堡的测不准定律等一系列科学发现,以及流动的全球化及消费主义潮流,人们越来越发现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与演变过程,都处于特定的历史情景与关系建构之中,只有在关系中才能真正把握事物的性质、功能与作用,从而克服长期主宰西方学术话语的主客体分化的二元论。这是关系地理学作为一种思潮和流派出现的渊源和背景。

关系地理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 Massey D^[2]、Amin A^[3]、Murdoch J^[4]、Harvey D^[5]、Thrift N^[6] 等,他们首先推动了人文地理的“关系转向”。根据地理学者 Whatmor 的观点,“关系思维”的转变意味着人们不是研究“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把世界理解为一个网络的不确定的实体构建^[7]。在 Massey 等学者看来,从地方、国家、领地到身体、自我与认同,没有本质性的实体和边界,一切都是关系性的构建^[8]。美国地理学者 Cresswell 在《地理学思想:批判性导论》一书中对关系地理学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梳理,反对本质主义,认为事物与现实没有一成不变的“内在”,而是由不断变化、并且彼此矛盾的行动交织而成^[9]。国内蔡晓梅等学者基于后结构主义背景对关系地理学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10]。由此可以知道,上述学者以多尺度的社会流动与各行动者之间的社会空间关系作为研究核心,推动了“关系范式”“关系转向”或者“关系地理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讨论^[10-12],其中所涉及的议题与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地理学、组织研究、现象学、行动者网络理论、女权主义以及发展研究等学科相关。

总的看来,地理学界掀起的“关系思维转向”,是人们对于长期以来占据西方学术霸权有关实在论(认为能够发现客观的社会事实)、实证主义(可以寻找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以及二元论等等思潮的批判。“关系转向”的出现,对于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例如空间、区域、地方、领地、尺度具有一种新的解释力。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当前人文社会科学思潮中

的几对核心紧张关系及其相关研究议题,跨越绝对二分与鸿沟,如结构与能动性、全球与地方、人类与非人类等。

1 关系地理学的理论主张

伴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拓扑学、行动者网络、非表征理论、拼装理论等思潮,关系思维是针对区域发展、城市网络、流动人口、文化认同等主题而出现的一种分析视角,并且通过持一种“开放的、流动的、网络的、不断生成的,以行动者为中心”^[12]的视角来挑战传统地理学。它主张所有的关系都是不断变化的、流动的、多空间的和异质性的;通过超越结构的、地方的、静态的思维方式,来审视各行动者在一定制度、空间、结构、规则下所涉及的各种权力关系运作过程与能动意图^[13]。此外,这种视角还强调基于各行动者的位置性与社会场域,分析人、物与事件在不同时空尺度上的各种网络关系,并对各种社会实践进行情景化与过程性的理解。

为了能够真实审视行动或行动者之间的联系,关系地理学主张从地方、空间和尺度 3 个概念入手,先把核心概念关系化,再解读行动或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 3 个方面:

1) 作为关系的地方。关系的地方认为地方由社会实践构成,并且反向构成了社会实践活动。地方的历史也是由各种网络关系与链接构成^[14]。作为关系的地方往往通过异质性的特征将地方与世界进行联系,超越了水平与垂直的关系。因此,在认识地方时,而不应该仅仅以严格的界线与单一的认同来定义。

2) 作为关系的空间。关系的空间认为空间是活跃的、动态的,由相关关系不断生成,而不是死寂的、封闭的、静态的或者仅仅只是一个结果。空间关系建构是一个充满着共谋与竞争的过程,人与事物之间通过权力塑造了各种关系,从而在特定的空间与地点相互依存并且产生角逐。同时,空间是多样性的集合,这正如同 Massey 所说:“没有空间,就没有多样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空间……多样性与空间是同构的”^[15]。因此,在认识空间时,应该把空间理解为一种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存在多方力量和多种关系的博弈,彼此之间不停地制造着差异和复杂性,体现出“权力几何学(power-geometry)”的特征^[15]。

3) 作为关系的尺度。它认为尺度是层级结构与空间想象结构的网络关系,是去中心和去本质主义的,不仅包括了从上至下的垂直想象,也包括了一种水平的空间辐射关系。同时,垂直性层级与水平性网络相互交织,互相渗透^[16]。这种网络式的关系尺度,要求我们要把尺度与历史性、位置性和政治性关联起来。

总体而言,关系地理学主张用一种多元、多维、多形态(polymorphic)的分析框架去研究“TPSN(Territories, Places, Scales, Networks)”,即领地、地方、尺度、网络以及流动性、位置性这些概念都是在相互建构、关系与交织在一起的^[12]。

2 关系地理学的研究范式

世界是关系的,一切都在邂逅、生成与对话之中。以关系思维的研究范式重新认识“关系”,进而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关系地理学主要通过三大研究范式进行理论与经验研究的拓展,包括社会空间本体论范式、尺度位置认识论范式、政治权力反思范式。

1) 社会空间本体论范式。社会空间本体论范式主要探究世界究竟是怎么组成的,拒绝原子主义、普遍主义、个体主义,并且主张应通过网络、关系和互动去理解主体、地方、能动性,认为空间、主体和过程是不断被结晶化、聚集、转化、制造和生成;空间是超越单一地方与尺度而被各种关系进行构建^[17]。

社会空间本体论范式有助于再认识人地关系,它强调自然并非先验的、僵化的物质实体,而是动态的、不稳定的社会建构过程;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核心的“社会建构”息息相关,研究“自然的”地理学应当是“有人的地理学”^[18]。同时,随着全世界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大,人地关系协调论越来越成为人文地理主要关注的内容。把人地关系放置于一个网络结构中,有助于阐释当前人地关系的复杂性和多维性。中国传统思想有着丰富的人地协调关系思想精华,“天地人和”“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可纳入当下的地理协同论之中,从而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特别是进入“人类世”时代,伴随着星球文明的转型和生态危机,对于人地关系的认识更应从之前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以自然和生物为中心,从过度的消费主义转向持续的人地和谐观。

以关系地理学的视角去探究人地关系,有助于深刻认识到社会与环境、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混杂性与纠缠性,不能简单截然二分。同时,建议把人地关系纳入文化表征、权力运作、知识生产与社会建构的过程分析。

2) 尺度位置认识论范式。此范式认为研究者和观察者的分析尺度和实践尺度都是相对的和不断变化的;主张对于当代人文世界的分析与解读,应持平面本体论,反对层级尺度和本质论。所谓地方、国家、全球,以及单元、区域、边缘、中心、水平、垂直这些与尺度相关的概念,在文化、认同、表征以及权力的多重合力作用下,是一个辩证发展、持续构建和不断协商的过程^[19]。

传统研究把尺度定义为一种层级化的空间秩序,或一种垂直化的对于地方和区域的想象^[20]。受建构主义和不同尺度认识论的影响,有宏观尺度、中观尺度、微观尺度;身体尺度、家的尺度、社区尺度、地方尺度、区域尺度、国家尺度、民族尺度、文明尺度、全球尺度等划分,这种划分方式主张以一种结构的方式,从身体、城市、农村、区域、国家、全球等不同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21]。在关系地理学的影响下,尺度位置认识论范式已从传统意义上的层级尺度,逐渐被理解为一种扁平化的网络关系。同时,尺度一直在被再生产着,并无时无刻不被新的政治经济力量所形塑。某种意义上,再尺度化被视为一种社会化过程^[16]。当下关系地理学关注社会活动的权变性(contingency)与动力(dynamic),这表明尺度由宏观层面(如区域、制度)转向微观层面(地方、个体)。行动主体不再是单一的、一致的行为主体,而是一个包含多个潜在利益冲突的单元。区域、国家和全球尺度上的社会实践往往紧密联系到具体的地方,并注重考察其与地方和个体之间相互协商的过程^[16]。

3) 政治权力反思范式。此范式是基于话语霸权、知识生产与行动主体,揭示结构、行动者和主体之间多重权力关系而出现的,将空间视为物质、意义、认同与政治一同协商与相互建构的过程,关注地缘政治、资本聚集、权力表征、民族主义、殖民话语、全球政治经济的不平衡等话题,反思权力如何通过地方和场所来运作,主体如何表达正义、不平等以及抵抗与反抵抗等等。

政治权力反思范式致力于超越结构与能动性的两极化分,反思政治权力关系。在 Giddens 看来,

结构代表成套的规则与资源, 这些规则和资源规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并通过可以运作的权力与影响力, 控制与限制着人们的某些互动^[22]。事实上, 人们作为能动者并不一直是消极的, 他们的行为活动一直在再生产并改变着其中的运行规则与资源。如中国传统哲学中, 根据天时地利, 人在社会关系和行动上作出能动性的调整, 以达到“善治”。此外, 在结构与能动性关系分析中, 结构和行为主体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这种相互作用的程序与性质不是事先给予假定而是受到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 其结果具有开放性。这一范式以关系性思维审视了在一定的权力结构下人的行动和实践如何受到限制, 人又如何发挥能动作用挑战现存的权力关系, 并与结构、霸权等进行协商和谈判, 强调权力如何形塑空间、人如何栖居于空间、如何触景生情、地方如何体现出主体性和世界性等议题^[23-24]。因此, 以关联的思维政治权力关系, 有助于研究资本、种族、性别、身体、阶层、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以及社会变革等议题。

3 当前关系地理学主要议题与观点

3.1 自然与文化的关联性研究

自启蒙运动以来, 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帝国商业扩张与文化探索, 自然与文化的界限与联系一直为无数学者所讨论。在当代著名地理学家 Whatmore 看来, 当下人们不再将自然与原始、田园风光, 以及乌托邦式的野生动植物图像联系起来, 而是将自然视为人与动植物、土壤、文化与物质之间的网络关联^[7]。同时, 自然是被社会和文化建构的, 各种“自然”的话语充满着政治文化意味和文化表征。地理学家 Castree 认为自然是被生产出来的^[25]。而 Smith 将人生产自然的这种革命性变化称为“第二自然”, 以区别于“第一自然”即处于“上帝赋予”或“原始”状态的自然^[26]。Wilson 则认为当下我们所见到和正体验的自然, 其实是已受到技术、摄影、工业、广告、美学以及教育、旅游和文化机构修饰过的^[27]。人文地理学从环境决定论到社会建构主义的转换, 表明了由于对自然与文化的截然二分, 以及将自然视为文化和社会之外, 导致了人们对不断变化中的世界所进行的描述和解释出现了很多局限和谬误。

当下的人文地理越来越密切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人、植物、动物、机器之间流动的、混合的景观世

界, 将野生动物、转基因生物、人工智能包括人的身体作为一个个新的研究主题, 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已难以截然对立认识。从关系的思维来看, 自然与文化之间具有混和与纠缠的关系^[28]。运用关系的思维重新思考人文地理学中的“人”“文化”以及外面世界的“自然”, 有望消除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分离^[28]。如哈佛大学教授 Schlesinger 在《帝国之裘: 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29]一书中提出的自然与文化实际上是一个“混合体”, 二者之间具有复杂的关系, 并且揭示了清帝国的王公贵族们, 是如何通过对野生动物的消费来标榜自己高贵的地位, 并显示其财富和权力。清朝王室通过进贡制度, 向东北地区征收貂皮、珍珠、人参等野珍, 一方面这些物产代表了清王朝发源地的富饶, 并充满生机的象征意义;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清朝皇室通过对自然一词的建构, 来维持对于帝国边疆的一种想象与控制。

3.2 人类和非人类的关联性研究

人类从一出生起, 其生命活动就与生物、社会和物质世界交织在一起的, 比如我们使用手机、服维生素、打疫苗、去野外探险、享受农家乐与泡温泉等等。如同有些学者所说, “我们都是嵌合体, 是机器和有机体的理论化和虚构的混合体; 简而言之, 我们是半机械人”^[30]。换言之, 人类其实是与多种非人类的关系来界定的混合体。半机械人、生化人是我们的现实, 多样化、杂交和混合是我们的本体^[30]。这为研究物质文化开辟了新途径, 将人与非人类、物与非物、主体与客体、思维与物质、自然与社会置于一种关系的维度, 认为彼此关联的方式造就了彼此, 强调注重非人类的物质性、物体能动性 & 活力的研究。当下人类和非人类的关联性研究主要体现在“超越人类地理学”流派的一系列研究之中^[31], 这一流派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重新发现自然”思潮, 其领军人物 Whatmore 主张利用生物哲学、科学研究和现象学对人类和“非人类”在世界中的关系进行理解, 且越来越关注人类感知和参与周围世界的共情能力。

人类和非人类的关联性思维可以更好地了解世界上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动态关联, 以及获得基于共享、互惠的景观知识和共情经验^[32], 从而克服人类自然的、固有的以人类为中心的偏见。这其中包括人类、动物和其它生物以及无生命的物体, 甚至包括精神和梦想等方面, 以此挑战人们固有的知

识传统和想当然的假设。如在《水地方：文化、社会和“超越人类地理学”的自然》^[32]的案例中，Gibbs通过考察澳大利亚内陆伯兹维尔湿地打井、钻孔、养牛、挖矿以及石油勘探和土著生计的人文活动与社会景观，认为水不只是一种自然物质，还具有社会性，人们与之有着紧密的社会关联和经济依存关系，并且一直是当地沙漠世界的积极参与要素。钻探活动开展以来，当地生态系统发生了改变，形成了新的湿地景观。以此说明文化、社会和“超越人类学地理学”的自然可结合起来，一起揭示“水地方”是如何在制度、政策、人的活动与自然等元素之间被治理出来的，以及人类、动物、生物、矿产、地方之间共生互惠的依存关系。

3.3 行动者与网络关系研究

进入 20 世纪以来，无论是作为实在现象，还是一种比喻，网络概念一直贯穿于地理研究，比如一些空间分析研究者和交通地理学家研究公路网络、交通枢纽和互联网的连接；经济地理学家研究区域交易、产业集聚和全球的商品链；生态地理学家研究生态网络和物种关联……，这些都是受到了网络概念的启发。与传统的网络分析方法不同，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关注各种各样的行动元，穿越于微观与宏观之间，形成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行动网络与权力关系，注重从关联的角度，对自然、空间、社会和其它非人的因素联系起来并且进行理论化，讨论行动者联系而成的“关系网络”。其中的代表人物 Latour 认为，他并不是想创立一个关于什么社会构成的理论，只是试图强调一种分析社会世界的民族志方法^[33]。“行动者”可以指人，也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每一个行动者就是一个结点，结点之间相互联通，共同编织成一张无缝之网。这里的网络并非实质意义上的有形网络，主要意指各行动者(人、物、技术、自然、社会)之间的相互协商与相互关联^[34]。

将行动者与网络关系思维应用于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多主体行动者之间的策略与互动，彼此之间的权力关系，不同地理尺度和社会空间之间的接合与矛盾。如 Callon 以法国电器公司开发新型电动车为例^[35]，其中的行动者包括电器公司、铅蓄电池、汽车底盘、政府部门、大众媒体及电动车消费者等，构成了一个行动者网络，而法国电器公司扮演着“转译者”的作用，要替电池、消费者、政府部门、汽车制造商发言，转译各方的立场与利

益诉求，协调利益相关者达成一个新的行动者网络。Callon 认为，发起的行动者主要通过问题呈现、利益提出、征召动员、达成共识、异议协商等过程，让人类和非人类的各行动体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动性，一起参与行动。各行动体没有主客之间的对立，形成相互依存的网络世界，创造新的联结与秩序。而这些秩序与网络联结都是各行动者自己造成的，他们之间的结果永远不能预知和被结构化，强调跟着行动者走^[36]，事物随时都在发生变化。所以行动者与网络的关系思维非常适合解释和描述各种秩序、机制与共识达成的形构过程。

3.4 地方性与全球化的关联性研究

地方是多种关系建构的产物，地方性是人对地方的依恋以及空间生产的结果^[19]。全球化是一个想象的世界，是由地方上各种关系所生产出来的^[37]。著名地理学家 Swyngedouw 认为全球化的过程是在地方上进行实践，这种实践会因地方空间的特殊性而形成个性化的人文景观。不存在同质的全球化，也不存在单向的在地化，全球化与地方性是多种力量在不同地理社会空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发展^[38]。从关系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我们把世界理解为一个不断生成和运动的关联体系，身体、地方、景观、生态和文化都席卷其中^[39]。而全球化能将各种关系与距离压缩为一个小尺度的剧场，不断地生产着地方性^[40]。对此，地方性与全球化并不是截然二分或对立的，而是彼此交织和纠缠。在世界体系之下，我们观察到一种基于地方感的全球意识出现，即地方的信息、观念、人员、资本和事物的流动，构成了全球化的“杂糅”景观。对此，Appadurai 将之描述为族群景观、媒介景观、技术景观、金融景观与观念景观^[40]。这意味着全球化是通过地方不同的行动者，如民族国家、多族群、离散社区、亚文化群体以及村庄、邻居和家庭来进行“历史、语言和政治上”的建构，并以“混合”和“杂糅”的景观状态不断地生产着差异。

例如 Giulianiotti 和 Robertson 通过选取移居北美后分布在各大中城市的苏格兰凯特人的足球俱乐部和漫游者足球俱乐部的案例^[41]，这些研究审视了跨国移民中的地方性与全球化的交织与再生产现象。作者发现跨国移民文化表现出 3 个特征：将原来的地方文化重新移植到新的环境之中；在跨国流动中不断延续的文化认同；在日常体验中实施全球在地化的策略。全球化推动着当地传统文化的重新建构

与发明, 跨国移居群体通过“家园意识形态”与强烈的“乡愁”, 超越地理区域与空间尺度, 最终形成想象的共同体, 并通过各种媒体形成“去域化”的情感社区。全球化以同构的模式形成了“世界社会模式(world-societal models)”、国家认同与标准实践, 但也以随机和偶然的形式生产着文化异质性; 同时地方也在生产着“地方标准”, 力求与全球其它的地方产生关联。

3.5 多元纠缠关系研究

关系地理学认为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多元而且是变化的。对此, 除了自然和文化、人类与非人类、地方性与全球化等二元关系之外, 已有学者尝试厘清更为复杂和多元的关系。对此, 一些关系地理学者提出了“纠缠地理学”(entangled geographies)^[42]的概念, 认为受当下复杂理论的影响, 考虑到理解世界生物、物理和社会的整体性以及多样性方向, 人与物、自然与文化、空间与地方应是一种相互影响和互相纠缠的关系, 万物彼此依赖, 不分主体与客体, 这种关系的产生, 囊括了所有的人类、生物、空间、地方、观念以及社会制度。多元纠缠关系的研究主张反对本质主义和任何静态式的结构式分析, 注重考察特定社会空间关系与不同地理尺度下, 人、地方、事物与要素如何交织、纠缠与混合的过程。这种关系研究着重于挖掘超越空间的相关活动、参与者(人类和非人物)的多样性、拼装组合中的多元关系元素, 试图动态和全面的认识复杂世界、解释纠缠关系。

例如地理学者 Clancy 等在《纠缠、自治和景观的共同生产: 在快速变化世界中自由漫游的“野驴”的关系地理学》^[43]一文中, 运用关系地理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 从野生动物地理学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 描述了自由漫游的驴如何与不同文化和历史景观之间的纠缠与嵌套关系。作者将这些驴与急速变迁的景观、社会和经济之间的紧张关系联系在一起。早先, 驴伴随欧洲对“新大陆”的殖民, 是重要的交通和贸易工具, 而现在, 随着现代交通业与农业机械的发展, 驴由驯养沦为野生, 到处自由漫游。在一些国家中, 驴被列入外来“入侵物种”或者“野生”的动物类别, 但是这对于国家的环境治理与公共话语带来了两难。因为如果驴被列为“入侵物种”, 那么这些驴是一种非本地物种并且为生态非法的与“不适宜”的; 若列入“野生”动物类别, 那么这些驴有助于促进地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修复。于是

导致了科学文章在“野生(wild)”与“野性(feral)”之间概念的含糊不清。因此, 需把驴与文化、历史、空间、自然等要素关联起来, 才能更有效地认识现象、理解变迁。

4 结论与讨论

当下的关系地理学, 是在众多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思潮的背景下, 通过克服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局限, 反思本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静态式分析, 将事件与现实纳入政治经济学、权力关系、性别认同、空间正义、社会不平等的关系视角之中, 其认识论转向更加开放、流动和复杂的空间关联思维, 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于空间、地方、尺度等关键地理概念的理解。然而, 需要说明的是, 地理学思维的关系转向, 并非是在认识论上超越了以往所有的人文地理学流派, 也不是通过集大成的思维方式用其它学派的观点来支撑。它的出现是为了说明世界是流变和复杂的, 提醒我们需要以一种去中心、异质化、动态化、多维度的思想去认识世界。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潮与范式, 关系地理学具有一定的普世解释力, 但关系地理学在解释中国经验时如何进行有效地落地和对接? 如何解释当下中国融入全球化所带来人们社会关系与生活方式的急剧变迁? 如何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当下乡村振兴战略与地方产业发展等议题上拓展出新的学术视野以及研究思路?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话题。

首先, 就学术思想史而言,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里, 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关系”的社会, 这里的关系不仅是指一种社会或组织上的差序或关联, 更与中国特定文化中的“面子”“人情”“熟人”以及血缘、乡缘、地缘、业缘等概念和内涵相关。中国的“关系”概念带有中国文化特有的独特价值、礼仪、意识形态与民间信仰成分。即便经历了快速而剧烈的现代化, 中国文化中的“关系”和“网络”概念依然有着强烈的血缘、地缘和姻缘特点。从农村到城市, 他们利用复杂的社会网络与行动策略来应对各种环境下的生活需要与社会变迁, 这恰是关系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之一。运用关系地理学的思维, 对中国不同情景下社会成员之间结群、交往、流动与互动进行分析和研究, 有利于从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去理解中国人的生活。

其次, 在经济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领域, 中国

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关系地理学应用的典范,其主张经济全球化、命运共同体、地缘关系、社会治理等议题,已突破了传统地理学的学科特征。其中,中国在全球网络结构中的位置,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关系、跨境流域治理与地缘经济合作,以及如何处理好与西方霸权国家的关系、一带一路如何反思世界体系中沃勒斯坦的“中心-外围”结构关系、如何解释一带一路中自然要素(资源、信息)、人文要素与地缘关系之间交互杂糅的复杂性等等,为关系地理学研究提供了大舞台和新的思考空间。与此同时,当下中国经济的地方生产网络与产业集群的要素整合,如何与更广泛的世界经济体系相关联,如何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的空间经济行为和社会治理模式,包括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这些都有利于拓展中国新形势下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地理学视野。

此外,“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多次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倡议在开放包容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构建公平、合理和公正的新的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地区与世界、民族与国家之间和谐发展关系,实现人文地理学所追求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这是关系地理学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服务的重要学术契机。如何将中国的经验和概念推广到世界,用我们的理论创见引导西方认识全新的、立体的中国,以“中国化”的图景去影响和型构全球化方向和世界秩序的构建,关系地理学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前沿视角。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Massey D. Power-geometry and a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M]//Bird J et al.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1993: 60-70.
- [2] Massey D. For space [M]. London: SAGE, 2005.
- [3] Amin A. Regions unbound: Towards a new politics of place[J].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2004, 86(1): 33-44.
- [4] Murdoch J. Post-structuralist geography: A guide to relational space[M]. London: Sage, 2005.
- [5] Harvey D. Space as a keyword [M]//Castree N et al. A critical reader.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270-294.
- [6] Thrift N.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Space, politics, affect [M]. London: Routledge, 2008.
- [7] Whatmore S. Hybrid Geographies: Natures cultures spaces[M]. London: Sage, 2002.
- [8] Massey D B, Allen J, Sarre P. Human Geography today[M]. London: Polity Press Cambridge, 1999.
- [9] Cresswell T. Geographic though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12.
- [10] 蔡晓梅, 刘美新. 后结构主义背景下关系地理学的研究进展[J]. 地理学报, 2019, 74(8): 1680-1694. [Cai Xiaomei, Liu Meixin. Research progress of Relational Geograph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st-structuralism.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8): 1680-1694.]
- [11] 苗长虹. 变革中的西方经济地理学: 制度, 文化, 关系与尺度转向[J]. 人文地理, 2004, 19(4): 68-76. [Miao changhong. Western Economic Geography in transformation: Institutional, cultural, relational and scalar turns. *Human Geography*, 2004, 19(4): 68-76.]
- [12] Jones M. Phase space: Geography, relational thinking and beyond[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9, 33(4): 487-506.
- [13] Dépelteau F. What is the direction of the "relational turn"? [M]//Powell C et al. Conceptualizing relational sociology. New York: Springer, 2013: 163-185.
- [14] Cresswell T. In place/out of place: Geography, ideology, and transgression[M].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 [15] Massey D B. Power geometries and the politics of space-time [M]. Heidelberg: Heidelberg University, 1999.
- [16] Swyngedouw E. Scaled geographies: Nature, 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M]//Sheppard E et al. Scale and geographic inquiry: Nature, society, and metho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4: 129-153.
- [17] Massey D. World city [M]. Cambridge: Polity, 2007.
- [18] 朱竑, 尹铎. 自然的社会建构: 西方人文地理学对自然的再认识[J]. 地理科学, 2017, 37(11): 1609-1616. [Zhu Hong, Yin Duo.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 Western Human Geography on natur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11): 1609-1616.]
- [19] Jones K T. Scale as epistemology[J]. *Political Geography*, 1998, 17(1): 25-28.
- [20] Howitt R. Scale and the other: Levinas and geography[J]. *Geoforum*, 2002, 33(3): 299-313.
- [21] 刘云刚, 王丰龙. 尺度的人文地理内涵与尺度政治——基1980年代以来英语圈人文地理学的尺度研究[J]. 人文地理, 2011, 26(3): 1-6. [Liu Yungang, Wang Fenglong. Concept of scale in Human Geography and politics of scale—Based on anglophone Human Geography since 1980s. *Human Geography*, 2011, 26(3): 1-6.]
- [22] Giddens A. Structuration the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M]//Bryant C et al. Gidden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a critical appreci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1: 201-221.
- [23] Delaney D, Rannila P. Scopic relations as spatial relation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20, 45(4): 704-719.
- [24] 周尚意. 英美文化研究与新文化地理学[J]. 地理学报, 2004, 59(S1): 162-166. [Zhou Shangyi. Anglo-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New Cultural Geography. *Acta Geographica*

- [Sinica](#), 2004, 59(S1): 162-166.]
- [25] Castree N. *Nature*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26] Smith N.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0.
- [27] Wilson A. *The culture of nature: North American landscape from Disney to the Exxon Valdez*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2.
- [28] Cloke P, Crang P, Goodwin M. *Introducing human geographies*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 [29] Schlesinger J. *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30] Greenhough B. 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M]//Lee R et al. *Handbook of Human Geography*. London: Sage, 2014: 94-119.
- [31] 卢薇, 尹铎, 朱竑. 西方超越人类的地理学研究进展[J]. *地理学报*, 2019, 74(10): 2178-2191. [Lu Wei, Yin Duo, Zhu Hong. The progress of 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 in Western geograph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10): 2178-2191.]
- [32] Gibbs L M. Water places: Cultural, social and 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 of nature[J]. *Scottish Geographical Journal*, 2009, 125(3-4): 361-369.
- [33] Latour B. On recalling ANT[J].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1999, 47(1_suppl): 15-25.
- [34] Law J, Hassard J.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fter*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 [35] Callon M. The sociology of an actor-network: The cas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M]// Callon Michel et al. *Mapping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Springer, 1986: 19-34.
- [36]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37] 梁永佳. 期待与异化: 全球化中的移民与“移物”[J]. *社会学评论*, 2019, 7(6): 18-30. [Liang Yongjia. Anticipation and alienation: Migration of people and things in globalisation. *Sociological Review of China*, 2019, 7(6): 18-30.]
- [38] Swyngedouw E. Neither global nor local: "Gloc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M]//Cox K.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Reasserting the power of the local*.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7: 137-166.
- [39] Jones Owain. *After nature: Entangled worlds* [M]// Castree Noel et al. *A companion to Environmental Geograph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2009: 294-312.
- [40] Appadurai A.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M].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 [41] Giulianotti R, Robertson R. Gloc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migration: The case of Scottish football supporters in North America[J].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006, 21(2): 171-198.
- [42] Hodder I. The entanglements of humans and things: A long-term view[J]. *New Literary History*, 2014, 45(1): 19-36.
- [43] Clancy C, Cooke F, Raw Z. Entanglement, autonomy and the co-production of landscapes: Relational geographies for free-roaming "feral" donkeys (*equus asinus*)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J]. *Geoforum*, 2021, 123: 66-77.

Theoretical genealogy, research paradigm and implication of Relational Geography

Chen Zhengfu¹, Liu Meixin², Cai Xiaomei^{3,4}

(1.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ultural Industry,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reen Development Strategy High-end Think Tank of Guizhou, Research Center for ASEAN,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Guizhou,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65, Guangdong, China*; 3.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 China*; 4.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Cultural Space and Social Behavior,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mid-1990s, Human Geography research has witnessed a significant turn towards a relational approach, giving rise to Relational Geography as an influential and cutting-edge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hat challenges traditional geographical paradigm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academic connotations,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research paradigms, and current hot topics within Relational Geography. It argues that the core focus of Relational Geography is on the subject of action, emphasizing not only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mobility, connectivity, and social relations but also the exploration of individual experiences, cognition, and agency. This approach encompasses not only the extensive impacts of globalization on local societies, economies, and institutions but also the examination of localization,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and differential production, revealing clear tendencies towards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de-scaling. Rather than merely summarizing patterns or laws,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gional policies or social events within Relational Geography is predominantly based on actor networks and adopts a de-anthropocentric perspective,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situations, interactions, interpretations, and contingencies. Relational Geography highlights that the complexity of the present era cannot be adequately explained by a single theory or dominant ideology. Through a decentralized, heterogeneous, dynamic, and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it embodies the diversity, inclusiveness, and profound nature of geographical thinking. This shift towards relational thinking represents a critique of long-standing Western academic hegemony associated with substantialism (the belief in discovering objective social facts), positivism (the search for objective laws of human society), dualism, and other prevailing trends. By surpassing the limitations of human and physical geography and reflecting on essentialist and structuralist static analyses, Relational Geography incorporates events and realities into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relations, gender identity, spatial justice, and social inequality. Its epistemological shift towards more open, fluid, and complex spatial relational thinking significantly reshapes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key geographic concepts such as space, place, and scale. As a new research trend and paradigm, Relational Geography needs to effectively incorporate and apply its principles when examining Chinese experiences. China's traditional concept of "connec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idea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erve as prime examples of how Relational Geography can be applied and connected in practice.

Key words: Relational Geography; relationship turn; mobility; entanglement; Chinese experience